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 思想萌芽期与发展期的原创性

万海松

内容提要: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发展的梳理以及对其思想原创性的考辨,有助于把握作家及其作品所反映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1846—1847)、发展期(1848—1865)和巅峰期(1866—1881)。在萌芽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与其兄长在感情上亲近、思想上接近,但他发表的反映这一思想的代表作要略早于其兄之作;在发展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虽与其他思想家有过琴瑟之鸣,但其根基主义思想基本上属于独立见解。研究这两个时期并论证其原创性,同时考察其根基主义思想在这两个时期所延伸表达出的非功利文艺观等,对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根基派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要。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 根基主义思想 萌芽期 发展期 原创性

中图分类号: I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8)01-002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15ZDB092)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Title: On the Originality of Dostoevsky's *Pochvennichestvo* in Its Burgeoning and Developing Periods

Abstract: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and elucidating its originalit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ostoevsky and the ideas embedded in his writing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idea of *pochvennichestvo*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burgeoning period (1846-1847), the developing period (1848-1865) and the peak period (1866-1881). This article, based on textu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originality of *pochvennichestvo* at its initial as well as later stages. Initially, Dostoevsky suggested the idea in his magnum opus earlier than his brother although there existed an intellectual sympathy between them. In the developing period, *pochvennichestvo* stood uniquely Dostoevskian among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who shared an inspiringly similar view. A close examination of *pochvennichestvo*'s originality proves crucial to Dostoevsky's *Weltanschauung* as well as to the ideas informing his writing.

Keywords: Dostoevsky, *pochvennichestvo*, burgeoning period, developing period, originality

Author: Wan Haiso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China. Email: wanhaisong@sina.cn

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 又译根基派)思想是贯穿其创作的一条思想主线。为论述方便,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标志性作品的发表时间,本文将根基主义思想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期(1846—1847),以《穷人》(“Бедные люди”)和《彼得堡大事记》(“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的发表为标志;发展期(1848—1865),以《地下室手记》(“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和《鳄鱼》(“Крокодил”)的发表为标志;巅峰期(1866—1881),以五大思想小说(великое пятикнижие)^①为开端,以《普希金(演说)》(Пушкин [очерк])为巅峰。总体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在早期是独立产生的,虽然他与其兄长在感情上亲近、思想上接近,但他发表的反映这一思想的代表作要略早于其兄之作。在发展期,他虽与其他思想家有过琴瑟之鸣,但其根基主义思想基本上属于独立见解。思想共鸣并不意味着一方的思想实现从无到有的飞跃或全盘接受另一方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思想家互为知己是基于某些已有的共同认识,即他们各自的思想早已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在深化期的顶峰之作,则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普希金(演说)》,这将其根基主义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本文重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萌芽期和发展期,并论证其原创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出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激情,主张对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和西方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的观点进行调和。他既指出斯拉夫派的某些做法过于保守、脱离俄国现实,又批评西方派全盘引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主张,认为过于保守和全盘西化都会侵蚀俄国的根基和俄罗斯文化。为俄国的现在和将来计,他呼吁从俄国东正教文化中寻求可以抗击异质文明和异己思想入侵的文化因素,倡导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相信俄罗斯文化一定能理解并同化西方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将会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鉴于知识分子是接受和践行思想的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那些因迷恋于各种异己思想而在俄国处于漂泊状态的知识分子,呼吁他们尽快结束漂泊,回归俄国人民和东正教文化。他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胜任人民领路者的角色,带领全体俄国人民将俄罗斯民族和文化发扬光大,将其打造为可供世界其他民族学习的楷模。

时至今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认识,陀学界(достоевсковедение)还存在一些争议:一、对其最早出现的时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其出现在《彼得堡大事记》创作期间(Осповат 146-47),有的认为其出现在《时代》(Время)杂志的征订启事中;二、对其是独立产生还是受格里戈里耶夫(А. А. Григорьев)影响看法颇不一致(Кирпотин 12; Долинин 270);三、对西伯利亚流放是否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转变期存在争论。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像他这样十分关注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思想者不在少数,因此不能排除他们在最早萌发这一思想时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在这些争论中,正好可以捋出一条线索,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根基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而考察和辨析其根基主义思想的萌芽期与发展期及其独创性,对把握其思想及其在这一思想流派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Кудрявцев 160; Гуральник 433)。

① 即《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萌芽期(1846—1847)

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从小就是同道兼知己,两人在兴趣爱好以及文学创作思想甚至在世界观上,都有很多相同之处,有时简直很难分清谁是原创者。哥哥米哈伊尔(Михаил Достоевский)曾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说,弟弟是他的“唯一的朋友”。据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Анна Достоевская)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哥死后,每当回忆起哥哥,总是满怀着“最温柔的感情”,“爱他胜于其他任何一个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或许是因为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并且在青年时代是思想上的知己”(Белов 273)。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年龄相差仅一岁,从小生活在一起,接受同样的家庭启蒙教育和中学教育。1837年兄弟俩前往彼得堡,准备报考彼得堡的工程部中专学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顺利入学该校,而米哈伊尔由于健康原因,没有被该校录取。次年6月,米哈伊尔考入雷瓦尔(今爱沙尼亚塔林)的工程部中专学校,自此兄弟俩才分开。出于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兄弟俩从学校毕业后,又先后从各自的工作岗位辞职,开始致力于文学事业,这样两人又在彼得堡重聚。他们都是从文学翻译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19世纪40年代末期,是兄弟俩在文学事业上的丰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因1846年发表《穷人》而在文坛一夜走红,随后至被捕这段时间里又接连发表《双重人格》(“Двойник”)、《彼得堡大事记》、《女房东》(“Хозяйка”)、《白夜》(“Белые ночи”)和《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Нечочка Незванова”)等十三部(篇)作品;而其兄则从1848年开始发表处女作《闺女》(“Дочка”),在1848—1850年先后发表《斯维焦尔金先生》(“Господин Светелкин”)、《麻雀》(“Воробей”)、《两个老头》(“Два старичка”)和《五十年》(“Пятьдесят лет”)等多部中篇小说、译作、剧本与评论。

米哈伊尔的早期创作也属于自然派文学,给自然派文学带来了一种融合了“心灵辩证法”和席勒式浪漫主义的新风格。其创作在很多方面的确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存在共同之处。有评论家注意到了其中一点:

由于安年科夫大笔一挥,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当作其弟的平庸模仿者之一。的确,对他产生影响的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感伤类小说”(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特科夫、普列谢耶夫、克列晓夫一同进入了40年代下半期聚集在《祖国纪事》杂志周围、以其弟为首的所谓的“感伤型自然派”之中),以及“自然派”(果戈理式的指名道姓的叙事方式,讲述“小官吏”故事的情节)共有的精神……(Богданова 266)

除风格相似外,兄弟俩的作品在思想上也有很多共同点。首先,都善于通过人物心理表白的方式颂扬底层小人物的善良品质。如在米哈伊尔发表于《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848年第11期的《麻雀》和1849年第11期的《两个老头》中,就能看到《穷人》中杰乌什金身上那些善良人的影子。其二是对“环境决定论”的批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房东》已体现了此种观点。小说女主人公卡捷林娜无力摆脱仇人穆林对自己命运的控制,竟跟随他做他的情妇。她没有把自己的软弱看成是社会的不公,而只

是归罪于自己的性格：“我自己竟没羞没臊地钟爱着我的耻辱，饥渴的心乐于追忆自己的不幸，犹如玩味欢欣和幸福一样——这才是我的悲哀，因为其中缺乏力量，缺乏为自己鸣不平的愤怒！”（406）米哈伊尔的《斯维焦尔金先生》（发表于《祖国纪事》1848年第10期）中的同名主人公，作为一个最终战胜逆境的成功者，一开始并没有抱怨环境和生活的不公，而是通过自身的勤奋劳动和美德获得了财富，娶到了心上人。第三，他俩的共同点还体现在对小人物品质的刻画上：从起初一味表现小人物的美好品质，到逐渐开始刻画小人物的负面品质如自私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中的格利亚德金身上有深刻的媚上欺下的无意识心理，米哈伊尔的《两个老头》中的小人物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最后，共同或相似之处还体现在作者对这些幻想家题材小说中的幻想家的理解上。所不同的是，在米哈伊尔的作品中既有积极的实干家，又有消极的幻想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作品中基本上只有消极的、疏于行动的幻想家。但是，无论是米哈伊尔小说中消极的幻想家，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幻想家，看起来都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长篇小说中一系列脱离根基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原型。

可以看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早期的思想、特别是根基主义思想的初创期中，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如果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完全影响和促使了他哥哥的思想的诞生，那至少可以说，他们共同的家庭教育和生活阅历，是他们产生这些彼此相似、不乏共通之处的思想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有些研究者已经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最早萌发那些带有根基主义萌芽的思想的大体时间：哥哥米哈伊尔的“社会政治观（‘根基主义’）基本上形成于40年代末期”（Богданова 265）；但是还要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根基主义思想，早在1847年4—6月发表在《圣彼得堡新闻》（*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彼得堡大事记”栏目的四篇小品文（统称为《彼得堡大事记》）中就已经具备了雏型。而且，在从《穷人》到《双重人格》和《普罗哈尔钦先生》（“Господин Прохарчин”）等以小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人物、也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的描写，由单一的赞美，逐渐走向美丑并举的立体展示。1847年发表的《女房东》，则标志着他根基主义思想的文学表达的确立，该小说中首次塑造出作为幻想家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其接触人民后发生的故事，涉及到人民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思考，而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则属于根基主义思想的基本要素。

在《女房东》发表后与被捕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的小人物主题的小说所塑造的小人物形象逐渐立体、丰满。严格地说，他在此阶段发表的作品中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来自根基的正面形象，而只有未完成的小说《涅朵奇卡·涅兹凡诺娃》中的同名主人公，才可算作名副其实来自根基、能胜任正面形象的小人物。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塑造一个完全来自根基的正面人物，虽然由于政治原因这一尝试未能最终完成，但这个形象寄托了他对草根人物成长为文化精英的希望，在相当大程度上演绎了他早期的根基主义思想。

发展期（1848—1865）

1848年是欧洲大地上风云激荡的一年，革命首先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爆发，随即法国二月革命波及整个欧洲，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让俄国的知识界为之振奋。向往法兰西“自

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莫斯科的定期聚会应运而生，解放农奴成为其探讨的首要主题。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和被判刑的原因，是他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并有将革命思想付诸实践的打算，主要理由是他参加过倾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倾向革命行动的杜罗夫小组。然而，他参加这些思想研讨小组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赞同这些小组主导者的思想和倾向。据他同时代人回忆，虽然他在被捕之前参加过一些探讨社会问题的小组，但他“从来就不是革命者”（Яновский 392；亚诺夫斯基 107）。再则，从后来公布的他接受审讯时的供词和答辩状看，其思想倾向与被捕之前在各个场合发表的言论以及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世界观，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于官方指控他在集会上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书信是带有传播革命思想的行为，他抗辩道，他是站在一个中立者的立场上朗读的，他并不完全同意别林斯基的观点，并告诉官方自己在结识别林斯基后的几年就跟他断交，完全是因为他们对文学的思想和倾向有不同的理解。至于他参加的小组信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傅立叶的学说，他解释说：“傅立叶主义不诉诸政治改革，它主张的改革是经济改革”（Достоевский, Т. 18 133）。而且，他丝毫不相信傅立叶主义有在俄国实现的可能：“至于我们，至于俄国，至于彼得堡，只要在这里的街道走上二十步，你就会确信，在我们的土地上，傅立叶主义只能要么存在于未裁切开的书本里，要么存在于温和的、毫无恶意的、幻想的心灵里，而且它恐怕只能是以田园诗或者类似的二十四首诗体歌曲的长诗的形式存在”（133）。从这些方面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捕和被判刑，并没有造成他的世界观的断裂，作为其世界观主体的根基主义思想也不存在转变。不妨说，1848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受欧洲革命风暴的触动而集中思考并参与讨论俄国现实问题的一年，他脑中对革命的想法并未被小组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与激进性质所同化。

实质上，流放西伯利亚时期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主要是根基主义思想）在现实中得到强化的时期，而并非有些论者所说的思想转变时期：“在西伯利亚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1848年法国六月革命的失败导致欧洲和俄国反动势力的猖獗，也打破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空想。在反动统治强化、幻想破灭的情况下，当时不少先进人士都曾经历过思想危机的阶段，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在狱中他接触的是各种犯人，除了圣经之外读不到其他书刊），没有找到解决思想危机的出路，他的思想便向右的方向转化了”（曹靖华 484）。只要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Записки из Мёртвого дома”）和其被捕前发表的作品对比，就不难发现它们在思想上的一贯性，这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脱节现象；略有不同的是，之前的作品多以作者之外的其他知识分子为对象，而在《死屋手记》里，作家自己成了被描写的对象。有赖此作，作家终于可以摆脱以往借别人的酒杯来浇自己块垒的束缚，直接诉说起自己对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现象和后果的切身感受。因此，他的苦役和流放生活并不标志着他的思想的转变期，而是他思想的深化期。

在西伯利亚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政治犯无权发表作品。将近十年后，他凭借自己家族的杂志，其根基主义思想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检验，终于迎来再度被公之于世的机会。这一再次论述根基主义思想的文章，就是署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兄的大名、发表在《灯塔》（Светоч）杂志 1860 年第 3 期的《〈大雷雨〉：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一出五

幕剧》(“Гроза”. Драма в пяти действиях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一文。有些研究者由于没有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大事记》和《女房东》等具有根基主义思想雏型的作品,遂将此文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根基主义思想的“首次”展现(Фридендер 407; Лазари 22)。而关于这篇文章的著作权,有些研究者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作品(Федоренко 132);也有一些研究者,如学者希洛娃(Н. Л. Шилов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15卷本)》的编注者等,则认定这篇文章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共同的思想结晶(Достоевский, Т. II 564)。在能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完全著作权的史料公布之前,我们不妨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了此文的写作,因为此文带有他在西伯利亚时期结晶的根基主义思索的浓厚色彩。此文表明作者与争论不休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持不同立场,宣扬艺术价值理应至上的原则,批判文学评论界的功利主义倾向,指责斯拉夫派对艺术问题持过于生硬的立场,以至于认识不清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的剧作《大雷雨》、特别是女主人公卡捷琳娜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的价值,即值得歌颂的纯正的、典型的人民形象,剧作家并非俄国黑暗势力和独裁统治的讽刺者和揭露者。此文“正面评价了格里戈里耶夫多年来所做的将《大雷雨》的作者奉为俄国人民戏剧创始人的努力,支持了格里戈里耶夫的一个看法,即奥斯特罗夫斯基说出了俄国文学中的‘新话语’”(Лазари 23)。这篇评论基本说出了根基主义思想的“人民性”要素,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格里戈里耶夫若干年来所论证的“人民性即是俄国精神根基”的观点,因而博得格里戈里耶夫的好感,也为他以后加盟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创办的《时代》杂志奠定了感情基础。

自此,格里戈里耶夫开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开始接近。“当他[格里戈里耶夫]于1862年夏初回到彼得堡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加入杂志[《时代》]的‘根基主义’阵营并为此做出贡献的准备,并且在年底之前成为其主要的发言人之一”(Whittaker 315)。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前者是根基主义思想的开创者,后者只是前者的学生。比如出现了这样的论断:“事实上文化‘根基主义’思想的发轫者和长期鼓吹者最初(至少在60年代以前)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而是格里高里耶夫[格里戈里耶夫]和他50年代的‘绿色’《莫斯科人》^①‘青年编辑部’,前者在某种意义上更像后者的门徒和追随者……”(李明举 156)还有一些研究者索性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完全源自格里戈里耶夫。比如有这样的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直接源自格里戈里耶夫发表在《俄国言论》(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上的评论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若干文章”(Егоров 193)。但事实并非如此,类似说法是无法证实的猜测。首先,就第一次出现根基主义思想的作品发表时间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大事记》(1847)要比格里戈里耶夫的《俄国民歌》(1854)早了七年。尽管“在《时代》杂志赋予‘根基’以特定含义之前很早,在他[格里戈里耶夫]的批评里‘根基’的隐喻意义就已经存在了”,但只是“在发表于1854年的《俄国民歌》中,格里戈里耶夫才第一次用‘根基’的隐喻意义来描绘民歌中‘如植物一样生长的诗歌’得以发展的民族资源或基础”(Whittaker 332)。而且史实表明,在格里戈里耶夫加盟《时代》编辑部、主持批评政论栏之前,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识。所以,这里排除了因谈话

^① 此刊刊名(Москвитянин)应译为《莫斯科公国人》。

或通信而存在思想交流或者相互影响的可能。因此,我们认为,美国学者惠特克(Robert Whittaker)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时代》杂志 1862 年办刊宗旨与格里戈里耶夫 1859 年为《俄国言论》所写的若干文章的契合点,才是他的有机批评理论与‘根基主义’建立联系的基础”(333)。再者,格里戈里耶夫即使在加盟《时代》之后,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没有很深的交情,况且他自加盟后不久就长期自我放逐在外省小城奥伦堡,通过与其弟子、也是《时代》编辑部成员的斯特拉霍夫(Н. Н. Страхов)^①的书信来往,保持着对杂志专栏的指导工作。终其一生,他只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两封信。因而,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完全来自格里戈里耶夫,只能说他们的根基主义思想是殊途同归的,并在同为《时代》编辑部工作时期实现了某些方面的交汇和呼应。但我们也不否认格里戈里耶夫加盟《时代》编辑部后,发表在《时代》等杂志上的涉及根基主义思想的文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他们的思想在后来又实现了分流,各自又有了不尽相同的发展。

《〈时代〉杂志 1861 年征订启事》(“Объявление о подписке на журнал «Время» на 1861 год”)是根基派共同的思想纲领之一,亦是陀思妥耶夫基本人的根基主义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述。这篇文章彰显了根基派的基本立场,即寻求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根基派认为没有必要再回到斯拉夫派所说的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去,但也不反对吸收欧洲生活中对俄国的发展有价值的历史经验。根基派从当前现实出发,看到了恢复一度被彼得大帝改革所打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之联系希望,指出普及教育是恢复联系的第一步,主张知识分子和所有俄国人都要立足于自己的根基,才能完成俄国社会即将到来的大转变。在这个纲领中,除了上述要素之外,还能找到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的痕迹,比如对根基的认识:“当然,失去了领路人、单靠自身力量的人民,其思想有时极为可怕,他们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非常丑陋。但是,其中有一种共同的因素,同一种精神,毫不动摇的自信,永不枯竭的力量”(Достоевский, Т. 18 36)。这句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前面几部小人物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根基观的回声。

根基主义思想的延伸性表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因其自发的原创性,在萌芽期和发展期呈现出诸多独特的延伸性表达或思想投射,具体体现在其非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对彼得大帝改革之于俄国东正教文化和人民之影响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与人民再度团结起来的信心等方面。

首先,非功利的文艺观是其根基主义思想的必然体现。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回应论战的需要,写了诸多批驳和回击性质的文章,最能代表他这一时期根基主义思想的是五篇“关于俄国文学的系列文章”(Ряд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即《引言》(“Введения”)、《——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Г-н -бов и вопрос об искусстве”)、《读书与识字·第一篇》(“Книжность и грамотность. Статья первая”)、《读书与识字·第二篇》(“Книжность и грамотность. Статья вторая”)、《晚近的文学现象:〈日报〉》(“Послед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явления. Газета «День»”),在这些文章里他充分展开

^① 斯特拉霍夫亦为根基主义思想的理论家,他才是格里戈里耶夫不折不扣的学生和信徒。

了征订启事中未及详细论述的观点。这些观点连同其中蕴含的文学和文艺观,也与其根基主义思想及原创性表达密切相关。他认为艺术应该去除其功利化束缚,但又反对脱离生活实际、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观。他认为,判断艺术的价值要看艺术的主题思想和体现主题思想的形式能否取得一致。他的这种观点是其根基主义思想在艺术论上展现出的“第三条道路”,介乎斯拉夫派坚持的纯艺术论和西方派坚持的功利主义之间。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坚信俄国东正教文化具有去芜存菁、自我净化的能力,但也不回避它所遭到的异质文明的挑战与进攻,这与斯拉夫派对俄国文化的竭力理想化和西方派对之全盘否定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彼得大帝之类的改革,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些不但未能对俄国文化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反而凸显了东正教文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扩大了人民的视野,激发了人民的潜能。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人民会有能力鉴别外来文化、吸收其精华部分,“随着人民的不断成熟,他们的天赋也在不断成熟和稳固,人民性也就显露得更充分”(Достоевский, Т. 19 1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不唯美、不粉饰,也没有因人民的缺点对他们失望,而是始终对他们寄予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无论未来资本主义怎样地人欲横流(人民避免不了这个劫难,他确信必然如此),但只要人民中还存在理想,人民在精神上就是不可毁灭的,他们就有力量克服一切诱惑、通过一切考验、消灭一切病态、度过一切难关”(谢列兹尼奥夫 242-43)。

第三,农奴制改革后,已经与人民脱离了两百年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再次与人民结合过来的历史机遇。作家在农奴制改革前就已经多次提到:普希金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学习的榜样。《死屋手记》诉说对知识分子与人民脱节的后果的真切感悟,作者为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隔绝而感到伤心和难过,又在朝夕相处的底层人民身上发现了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许多品质,发出不应在无益的内耗中浪费知识分子和人民的才华和生命的呼吁。《冬天的夏天印象》(“Зимние заметки о летн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批判那些俄国的“欧洲人”,也就是以彼得大帝为代表的西方派形象,描写了失败的俄国斯拉夫派的三种类型,向两派指明他们应该学习的楷模——以普希金为代表的“货真价实的俄国人”,反映出作者对工具理性的警惕与批判。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基主义思想的原创性不仅来自于家庭生活和所受教育及环境对他的影响,还缘于作家对俄国知识界关于俄国道路的论争和对世界思潮的总体把握,更源自对俄国东正教文化的内在自信。无论在萌芽期还是发展期,他的根基主义思想始终在批判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夹道中穿行,虽频遭两派攻击,仍奋力前行并逐渐壮大,因为这种主张比较适合当时俄国的国情。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根基主义思想,如同一粒落到地里的麦子,从生根、发芽到长大、成熟,最终结出了丰硕的子粒,并不断地在俄国大地上繁衍。在俄国历史改良和革命的双重奏的交替演进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业已成为俄罗斯思想中宝贵的精神财富,越来越被后世体认到其重要性。□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Белов, Серге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его окружение*. СПб.: Алетей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2001.

- Богданова, Ольга. “Статья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Би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ом 1 (А-Л)*. Под ред. Петра Николаева.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264-67.
- Гуральник, Уран.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лавянофилы и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 *Достоевский-художник и мыслитель.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2. 427-61.
- Долинин, Аркади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Страхо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другие: стать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9. 234-70.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ёдор.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18*.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8.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19*.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9.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5 т. Т. 11*. СПб.: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93.
- Егоров, Борис. *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0.
- Кирпотин, Валерий.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в шестидесятые годы*.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6.
- Кудрявцев, Юрий. *Бунт или религия. 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9.
- Лазари, Анджей де. *В кругу Фёдор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 Пер. с польск.: Мария Лескинен, Наталия Филатова. М.: Наука, 2004.
- Осповат, Александр. “К изучению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Ап. Григорье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ыпуск 3*.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78. 144-50.
- Федоренко, Борис.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 автор разбора драма А. Н.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Гроз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11 (1998): 131-47.
- Фридендер, Георгий. “У истоков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а’.”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5 (1971): 406-10.
- Шилова, Наталья. “М.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Кафедр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Web. 18 May 2017.
- Яновский, Степан. “Письма С. Д. Яновского к Ф. М. и А. Г. Достоевски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борник 2*. Пб: Мысль, 1924. 366-96.
- Whittaker, Robert. *Russia's Last Romantic, Apollon Grigor'ev, 1822-1864*. Lewiston: Edwin Mellen, 1999.
-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Cao, Jinghua, ed.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1989.]
- 季明举:《艺术生命与根基:格里戈里耶夫“有机批评”理论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Ji, Mingju. *The Living of Arts and the Soil: A Study on Grigoriev's Theory of “Organic Critique.”* Beijing: Literary Federation of China, 2005.]
- 陀思妥耶夫斯基:《女房东》,章云义译,载《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中短篇小说(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第353-440页。 [Dostoevsky, Fyodor. “Landlady.” Trans. Zhang Yunyi.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of Dostoevsky*.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1983. 353-440.]
- 谢列兹尼奥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刘涛等译。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5。 [Serezniov, Yuri. *Dostoevsky*. Trans. Liu Tao et al. Zhengzhou: Petrel, 2005.]
- 亚诺夫斯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刘开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Yanovsky, S. D. *Memories of Dostoevsky*. Trans. Liu Kaihua et al.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1987.]

责任编辑:黄晓晨